



孔子思想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
孔教學院·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主辦

一九九七年孔教學院慶回歸大典

孔子思想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

孔教學院長湯恩桂題



目錄

7	一九九七年孔教學院慶回歸籌備委員會	
9	慶回歸籌備委員會捐款	
10	孔教學院慶回歸十大項目	
11	孔教學院慶回歸大典暨十大項目等活動圖片紀要	
17	孔子思想與廿一世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	朱熹與中國書院.....	李才棟
26	印度尼西亞華人孔教的興衰.....	孔遠志
36	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的磨合與重構.....	陳華新
43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心理和文化健康.....	鄧繼強
49	傳統與未來談孔老孫三聖思想之精粹及其現代價值.....	謝祥皓
57	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學.....	林安梧
74	略論漢初儒學的發展.....	馬亮寬
82	儒家淑世思想的當代價值.....	姜國柱
97	孔子中庸方法及其在二十一世紀的功能.....	朱志凱
108	儒家思想為什麼能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于承武
113	試論孔子的哲學思想與教育思想.....	張騰宵
122	吸取孔子的智慧 發展人類現代文明.....	張友民
	The Enlightenments of Confuci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Zhang Youmin
130	“和而不同”與“一國兩制”.....	駱承烈
134	孔子“和”的思想與二十一世紀.....	駱承烈
141	The study of Confucius' Thought.....	Zhang Youmin, Li Tianchen
147	Harmony-A prescription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Li Tianchen
151	Confuci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ts Modern Value.....	Li Tianchen
158	大同思想與傳統文化.....	張成秋
166	聖之時.....	何竹平
167	孔子的人本思想與21世紀中國企業文化建設.....	秦正芳
173	論孔子的兩個基本人格類型.....	于民雄
180	儒學系統之孔孟荀儒學·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道統.....	李詩錦
191	孔子聖之時者也——二十一世紀與夫子之道.....	楊汝舟
202	孔子評傳與匡亞明先生評價孔子的方法.....	左成慈
206	孔子漸進論變革思想的現代意義.....	張以文
210	論子貢.....	林定川
215	對孔子“正名”說的歷史反思.....	陳憲猷
222	孔子中和哲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偉大作用.....	譚承耕
229	孔子兼容論.....	林定川
241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培養.....	韓理洲
246	中國傳統美德與孔學.....	郭蘭芳
249	中國孔廟在儒學傳播中的歷史地位.....	范小平
255	和而不同的永恆社會人生價值.....	黃開國·伍星明
263	試論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	柯遠揚
278	展望孔子思想與21世紀企業文化建設.....	柯遠揚
284	孔子思想的人文精神底蘊及未來價值.....	劉宗賢

295	現代社會與儒教的功用.....	吳錫源
299	孔子的和合思想與二十一世紀的和合精神.....	陳正夫
306	〈弘揚儒學 東方太平主義締造廿一世紀世界和平〉宣言.....	楊瑞文·史式
321	弘揚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建設中華燦爛的現代文明.....	蔣沛昌
324	孔子整理六經影響過去啓迪未來.....	陳克明
334	孔子學說與當代家庭倫理建設.....	牟鍾鑒
343	生態界之危機與韓國儒學之心性論.....	崔英辰
345	孔子思想的走向世界及其在 21 世紀的發展前景.....	陳 炎
351	中國文化和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劉章澤
358	孔子儒學及戲曲審美精神.....	胡芝鳳
364	孔子思想與未來人類社會.....	劉示范
375	多元文化的二十一世紀與儒學理念.....	羊濂生
381	市場倫理兼容.....	李道剛
384	孔子思想的現代價值.....	徐 淦
387	孔子門徒對二十一世紀的啓示.....	王 煜
395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對人類的貢獻與影響.....	孔令昭
397	孔子的智慧：義利之辨與天人合一.....	成中英
402	孔子思想與未來社會.....	唐亦男
416	孔子的文化多元觀與他的身份認同問題.....	周啓榮
431	孔子刑法思想與二十一世紀.....	朱華榮·王志德
	Confucius Thought of Criminal law and 21st Century.....	
 Nhu Hua-rong · Wang Zhi-de	
437	孔晏異同論.....	呂文郁
448	弘揚儒學 重在普及 貴在實踐.....	王安民
453	孔子言行的時代精神.....	周廣智
455	爲孔子平反迎接二十一世紀.....	孔令朋
459	儒家義利觀內涵辯正.....	陳升平
471	試論孔子思想對人類文明之影響.....	梅煥庭
483	弘揚孔子聖學創造新世紀文明.....	鄭彝元
486	孔子“中”的思想及其生態環境意義.....	溫 劬
495	儒教儒學和儒者.....	李 申
506	關於儒教的幾個問題.....	李 申
516	儒學與孔學.....	曾敏之
519	孔子的天道觀形成於晚年.....	謝寶笙
525	孔子思想與香港和平回歸.....	湯偉掄
530	孔子思想要義及其外拓性.....	陳乃森
553	和合精神對未來世界發展的啓迪.....	孔慶榕
557	生命成長與境界自由.....	張新民
570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的教育.....	柳光敏
577	論孔孟的思想與 21 世紀.....	趙駿河
582	在孔夫子德惠中躬行.....	薛中銳
587	二十一世紀與孔子思想.....	孔令仁
590	論儒家倫理和現代市場經濟.....	唐凱麟
608	淺議儒商與儒商時代.....	周慶林
611	儒家思想與現代文代思考.....	陳麟生
616	義和利 — 從相克到分立.....	吳 炫

628	朱子學與未來世紀的文化走向.....	蔡方鹿
632	回顧 2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陳增輝
645	奉行中庸之道開萬世太平.....	石詩元
656	孔子厄陳有靜氣 千年獄自仰高山.....	丁祥明·高東成
660	偉大教育家孔子為師之道.....	司英戰
667	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游喚民
673	孔子的師生情誼.....	陳美利
681	儒學的作用.....	金吉洛·金世貞
690	孔子思想與現代經濟.....	楊彤明
698	先秦儒學的地域特色、發展線索及其內容特徵.....	王鈞林
706	儒學與二十一世紀文化.....	吳鍾逸
712	孔子思想與 21 世紀.....	冉令君·李傳新
715	青年毛澤東與儒學.....	王興國
726	學而時習之辨.....	潘銘燊
733	孔仁在現代管理行為中的價值體現.....	龔紅月
740	從孫中山近代道德思想看孔子思想的現代價值.....	王杰
746	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定位致和之道.....	錢遜
751	通過《論語》看孔子的教育.....	金京玉
758	孔子的教育理念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教育.....	黃仁賢
764	孔子思想對未來教育工作的幾點啓示.....	馬兆祥
767	朱、陸學術異同辨析.....	朱漢民
774	略論儒學的和諧觀念.....	湯一介
779	孔子學說與俄羅斯政治文化.....	嵇遼拉
785	Confucianism and the Russian Spiritual Tradition.....	Lomanov Alexandre
803	孔子“和論”與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	王基文
819	良知與理性.....	袁尚華
824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精神文明重建.....	趙吉惠
839	孔子與中國科技文化.....	馮錦榮
847	從儒家學問看西方文化平面化的危機.....	陳沛然
861	The Millennium Riddle.....	Reginald Little
883	孔子人學論綱.....	朱仁夫
890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	湯恩佳
896	孔子的倫理思想及其對二十一世紀的啓示.....	劉金光
903	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	陳春
906	孔子思想的環境意識教育意蘊.....	高時良
911	孔子所說的“禮”與二十一世紀社會.....	何沛雄
916	弘揚採借儒家優秀家庭美德.....	沈壯海
922	試論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養.....	戴桂斌·馮覺新
929	二重變奏的歷史結合.....	鄒昌林
942	中國文化傳統與東亞現代化模式.....	高令印
950	“孔子思想與 21 世紀”研討會述評.....	武才娃
953	當代儒商，你在那裏？.....	楊子彬
969	孔聖頌	
970	禮運大同篇	

孔子“和論”與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

王基文

一前言：歷史簡要回顧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是世界最早文明古國之一。遠在 2548 年前，中國古代就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文獻整理家——孔子（公元前 551—479 年）。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繼承了夏、商、西周三個朝代的傳統，並加以發揚，創立了儒學。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孟儒學，在春秋戰國時期，雖不受時君世主所重視，正所謂“其道不行”，但在社會上還是有影響的。所以，在當時的“百家爭鳴”中，被稱為“顯學”，並且在治國之道中，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始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第一個統一多民族的中央專制集權的大王朝。他北拒匈奴，南平百越和通西南夷，開拓疆土，奠定了中國版圖基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是，由於他推行暴政，“焚書坑儒”，結果是所謂強秦，二世即亡，前後祇有短短十四年（公元前 221—207 年）。漢初賈誼認為，秦朝速亡，其主要原因是“仁義不施”，即是不用儒家思想治國的緣故。

漢初，從漢高帝（劉邦）到漢武帝（劉徹），即公元前 206—140 年期間，採用道法刑名之學，治國雖亦取得一定成效，但還是到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公元前 140—87 年），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也，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結果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漢武帝鞏固及加強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據勢力，統一了貨幣，開拓了疆土，把西漢王朝（公元前 206—公元 8 年）帶進強盛時代。西漢時期的中外交流，不論在經濟或文化上，都是很密切的。所涉及的地區，包括印度、中亞和西亞。自張騫出使西域之後，中西文化交流，更通過“絲綢之路”日益頻繁，所及之地包括當時的羅馬帝國。

秦始皇、漢武帝都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鼎盛時期，但兩人統治的後果卻不一樣，這裡說明了反孔與尊孔的不同作用。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往後兩千年，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的主導思想。

漢以後的中國大一統王朝，應推唐朝（公元 618—907 年），尤其是盛唐時代。唐朝的貞觀之治，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升平時代。太宗貞觀年間的疆域，“東及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南至林州（今越南境）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東西七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舊唐書·地理志》）唐代的對外交流，比西漢更突出，影響更深遠。唐太宗李世民說：“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 6）唐朝各時期的統治者，對道、儒、佛，雖然個別持有不同的態度，如武則天（公元 684—705 年）極端崇佛，唐武宗（公元 841—847 年）獨尊道教，但儒學的統治地位，仍然保持不變。再說，“秦王欲去儒而終不可去”。這些都說明了，儒學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極強適應性。

唐朝以後，宋、元、明、清都是崇儒的王朝。元朝（公元 1271—1368 年），雖然不是漢族建立的，但它的政治體系，主要還是仿漢族封建王朝的。它甚至尊崇以儒家爲主的漢族傳統文化，並以這文化教育蒙古的貴族子弟。清朝（公元 1644—1911 年），雖是滿族建立的政權，並且是以滿洲貴族爲主體的，但它的整個政治意識形態和架構，基本上仍舊離不了漢族儒家文化中心封建思想和體系。

元朝與外國交往的範圍，包括通過陸路而溝通波斯、敘利亞直達歐洲大陸，由海路通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波斯灣，以至北非。這種對外交流的範圍，可說是空前的。明朝（公元 1368—1644 年），相繼出現了強盛的“洪武之治”、“永樂之治”和“仁宣之治”，鄭和七次下“西洋”，擴大了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清朝的疆域，主要是在乾隆時代形成的。它東至鄂霍次克海和庫頁島；西抵中亞巴爾喀什湖北岸和蔥嶺；北達漠北哈克圖；南面領有海南島和南海諸島，包括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群島。幅員之遼闊，是清以前的各朝代所不及的。朝鮮、緬甸、暹羅、安南，都是清朝的朝貢國，或屬國。康熙（公元 1661—1722 年）、雍正（公元 1723—1736 年）和乾隆（1736—1796 年），都是清朝強盛時代。

用儒學治國，爲什麼能長治久安？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按照中國的古話說，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而儒學的功用，就是能做到“人和”。孟子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能否和睦相處，就成爲社會治亂的關鍵。中國古代各個朝代的強盛時期，都是與社會安定分不開的。儒家的“人和”思想，就是其文化驅動力。“人和”，就是人際和諧，是儒家“和論”的最主要內容。儒家“和論”是穩定社會的哲學。

在古代，儒學很早也傳播到東亞其他國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箕氏朝鮮時代，孔子思想便和漢字一起傳入這個國家。高句麗、百濟、新羅鼎立的三國時期（公元 1—7 世紀），儒學思想就逐步成爲三國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公元 285 年，百濟王還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獻《論語》、《千字文》，把儒家思想，由朝鮮傳入日本。公元 675 年，新羅統一朝鮮，大量派遣留學生赴唐學習，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開始供奉在太學，儒家越來越受到重視。公元 935 年統一朝鮮的高麗王朝：一面尊崇佛教，一面繼續推行儒家教化，許多大儒開辦私學，使儒學教育具有廣泛群眾性，影響更爲深刻。1392 年取代高麗王朝的李氏朝鮮，改變高麗王朝儒、佛並重，全力推行儒學，使之成爲唯一正統思想。儒學在李朝達到全盛時期，當時儒學主要是朱子理學。漢城“成鈞館”就是在李朝成立的，至今已有六百年左右的歷史。在朝鮮古代，尊崇儒學，不遜於中國。儒學在古代朝鮮，一直佔統治地位，甚至延續到十九世紀末。

儒學是由朝鮮傳入日本，始於公元 285 年。從奈良到平安時期（公元 710—1192 年），官吏的選擇考試，題目都是有關儒學和漢學的。從鎌倉時代到江戶時代的六百多年間，是日本的封建時代，天皇名存實亡，中央政權掌握在武人的幕府手中。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奉儒學爲聖教，大力提倡尊孔讀經，用行政手段嚴禁“異學”，遂使儒學成爲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是日本儒學的鼎盛時期。他們推崇的也是儒學中的朱子理學。儒學不僅在日本古代有著深遠

影響，而且在 1868 年明治維新之後，尊孔之風還是有增無已。從明治維新到現在的一百餘年中，日本對中國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從未間斷過，除中國本身外，在世界上日本是研究孔子儒家思想，成果最多的國家。

除東亞國家外，儒學傳入越南，為時亦早，比日本還早近五百年，遠在秦末漢初，孔子思想及儒家經典即已開始傳入越南。公元 111 年，漢武帝在越南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後越南歷中國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而至五代，為時一千餘年均為中國郡梁。孔子思想逐步深入越南，並且產生了很大影響。公元 1010 年，李公蘊在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更加提高了儒學地位。取代李氏王朝的陳朝（公元 1225—1400 年），使得孔子思想影響更加深刻、廣泛，儒學地位在社會上逐漸佔了優勢。公元 1428 年建立的後黎王朝，決定效法中國，獨尊儒術，儒學在越南步入全盛時期。1802 年建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阮朝，繼黎朝之後，仍以孔子思想為統治思想，獨尊儒學。

綜上所述，儒學不僅對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對東亞其他國家和越南古代社會文明，也有深遠影響。總之，孔子所創立的儒學，為人類的古代社會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兩千多年來，孔子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戶曉，融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裡，成為中華民族團結的內在凝聚力。孔子思想，不靠武力，遠播海外，如韓國、日本、越南以及各國華人社會，甚至也傳播到西方國家。公元 1687 年，巴黎出版了《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譯本，孔子學說正式傳入了西方國家。德國的萊布尼茲和沃爾夫，法國的伏爾泰和狄德羅，他們對孔子思想都有很高的評價。伏爾泰對孔子十分崇拜，認為孔子是天下唯一的師表，在自己的禮拜堂裡懸掛孔子像，寫詩讚美，朝夕禮拜。孔子思想傳入美國，是在十八世紀末。孔子儒家思想，在兩漢時即已傳入中亞細亞一帶。公元 1715—1860 年，沙俄先後派遣有十三批傳教士到華，在這些傳教士中，湧現出一批漢學家，他們把儒家經典翻譯成俄文，有的還著書立說，介紹孔孟思想。他們對孔子思想給予了很高評價，對儒家思想傳入俄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總之，孔子思想，已超出中國國界，成為世界文明的寶貴文化資源。

二、簡述孔子生平及其“仁學”

孔子的“和論”與“仁學”密不可分，所以談孔子“和論”之前，必須先瞭解他的“仁學”，而探討孔子思想，就要知道其形成和發展有關的生平。

西周末年，周天子名存實亡，一些強大的封國諸侯，互相爭霸，社會秩序混亂，出現所謂“禮崩樂壞”的局面，歷史上稱為春秋戰國時代。孔子生於春秋末期，力圖挽救這種局面。他提出“正名”、“復禮”，提倡“仁政德治”，為的是想恢復和安定社會秩序，使人際關係得以和諧共處。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魯國人，生於公元前 551 年 9 月 28 日。孔子的祖先，是宋國貴族，父親叔梁紇，魯國武士。曾數次立戰功，“以勇力聞於諸侯”，為陬邑宰。孔子三歲喪父，家境貧窮，由賢母顏徵在撫養成人。顏徵在娘家是曲阜大族，母子由陬遷居魯國國都曲阜城內闕里，寡母孤兒相依為命，勤勞儉樸維持清貧生活。正如孔子自己說的：“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十七歲喪母，從此自己就要獨立謀生了。十九歲取宋人亓官氏為妻，

婚後年餘生子。二十歲任管理倉庫的“委吏”，二十一歲改任管理牛羊的“乘田”，這些都是下層小吏，使孔子接觸下層社會，了解人民，對孔子的一生成就和思想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

孔子自少勤奮好學，不恥下問，到三十歲，已熟練掌握了“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並通曉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在學識上已打下了堅實基礎。正如孔子自己說的：“吾十有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從三十一歲到五十一歲任中都宰這二十年期間，是孔子的思想、學問和品德，在“立”的基礎上續繼不斷發展提高的過程，並即由“三十而立”，進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境界的過程。這為他以後從政、從教、治學獲得成就提供了更成熟的條件。孔子三十歲前後，開始創辦平民教育，收徒講學，三十五歲，因魯亂赴齊，到齊後，為高昭子家臣，藉以進見齊景公。三十七歲，齊大夫揚言欲害孔子，齊景公亦對孔子說：“吾老矣，弗能用也。”於是，孔子離齊返魯。迫於形勢險惡，倉促而走。

壯年以後，孔子進入仕途。五十一歲任魯國中都宰，卓有政績，“一年，四方皆則之。”中都宰，相當於中都縣專。五十二歲，由中都宰提升為司空，又由司空提升為大司寇，與三卿並列，攝相事。司空是管理全國水利、土木建設；大司寇是主管全國的公安司法工作。當時魯國領土不大，相當於現在中國一個較大的專署，一個專署管轄數個縣。孔子從地方官中都宰，進入中央機構任大司寇，仕魯時間，前後只有四年左右。任司空時間很短，而任大司寇的時間最長，約三年左右。當時魯國，實際執政者，不是定公，而是世襲三卿之一的季桓子。孔子任大司寇，名義上和三卿一樣，位列上卿，但辦事不是向魯君定公負責，而是向季桓子負責。

齊魯夾谷之會的勝利，孔子立了大功，齊想劫持魯君失敗，又得歸還魯國鄆、讎、郕三地。孔子使魯國以弱勝強齊，保全國權，充分顯示了一位偉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才能和膽略。從此，孔子更博得魯定公和季桓子的讚賞和信任，於是孔子五十四歲，受季桓子的委託，由大司寇代理季桓子處理國事，並參與國事的討論，即所謂“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和“與聞國政”。這時，孔子已躍居魯國第三號人物了。“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說的就是這時情況。

當時魯國政治混亂，定公虛位，三卿特別是季氏擅權，三卿之家又是家臣壟斷，孔子很不滿意，認為這是違反“忠君尊王”之道。孔子要強公室，抑三卿特別是季氏，貶家臣，便提出墮三都的建議。墮三都表面上是抑制家臣，實質上是要削弱三桓特別是季孫氏的力量，孔子的用意，被孟孫氏家臣公歛處父識破，致使墮成（是孟孫氏領地城堡）計劃失敗，亦即墮三都計劃沒有完成，這對孔子是個致命打擊。隨後，季桓子也警醒過來，知道了孔子的目的是要削弱三桓特別是他，從而，孔子和季桓子的矛盾顯露了，尖銳化了，迫使孔子不得不棄官匆匆離開魯國，作周游列國之行。這時孔子是五十五歲。

孔子是一位有遠大抱負的人，他周游列國的主要目的，是游說諸侯，以推行他“仁政德治”的主張。司馬遷說：“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幹七十餘君”是誇大，王充說，至多不過十國，有文獻可查的，到過衛、陳、曹、宋、鄭、蔡大小六個國家，經過而停留過的地方，有記載的，是匡、

蒲、陬鄉（衛國）和葉（楚國）。這些國家和地方，主要是今山東和河南兩省。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所任惟衛陳兩國，所過惟曹宋鄭蔡。”在衛國前後兩次長達十年，在陳國也有四年，二者合計十四年。周游列國之前，還到過齊國，這次棄官離魯時，不東向去齊而西向去衛，是因為和齊景公有矛盾，不便去。孔子在周遊列國期間，目的是“求仕”、“行道”，希望找到一位理想中的賢明國君，能用他實行“仁政德治”的主張。此外，他還利用各種可能條件，對弟子講學，不斷和人討論各種政治、倫理、歷史和學術問題，在教學和治學上很有成績。但是，當時的國君，對孔子以禮相待，他們大都急功近利，對孔子的政治主張卻不採用。衛靈公雖然也給孔子“奉祿六萬”，但既沒有要他“為政”，也沒有向他“問政”。孔子離開魯國，奔走列國十四年，實現自己“仁政德治”的理想已無可能，於是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返回魯國。這時孔子已六十八歲。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為了實現自己“仁政德治”的主張，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條件下，帶著數十個隨從弟子，走走停停，花了十四年功夫，訪問了六國國君，雖然歷盡艱險，到處碰壁，仍不灰心，故不論其主張是否切合當時實際，而這種奮鬥不懈的精神，至今仍令人敬佩不已。

孔子一生從事教育，在結束周遊列國返魯之前，是以政治為主，教育為輔。返魯之後，專心致力於教育。同時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整理，作了巨大工作。孔子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而且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文獻整理家，主要功績，是整理、傳播和保存了“六經”，即詩、書、易、禮、樂、春秋。樂經軼失，現僅存“五經”。經過孔子整理的“六經”，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別是春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況，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政治社會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古代文化瑰寶。孔子打破了貴族的文化壟斷，以個人身份整理文獻的偉大實踐，開創了私人著書的學術風氣，成為後來諸子百家竟相著書立說的先聲，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百家爭鳴”時代。公元前479年3月14日，一代哲人孔子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三歲。

“述而不作”，孔子沒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論語》一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根據直接記錄和傳聞，整理出來的孔子言行輯錄。內容有孔子談話，答弟子及時人問，還有弟子間的談論。約成書於春秋末至戰國初。是我們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主要文獻。《老子》、《論語》二書，乃是中國古代最好的兩部著作。

中國古代哲學，起源於殷商，歷經西周，形成於春秋戰國。中國古代無哲學一詞，只有哲人這個稱謂。哲學一詞源於古希臘，為“愛知慧”之意。哲人一詞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詩·小雅·鴻雁》：“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這個哲人，就是具有卓越智慧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和哲學家相似。孔子臨死前七天，長嘆曰：“哲人其萎乎！”孔子自稱哲人，也就是哲學家。孔子處於中國春秋戰國之交，是社會大變革時代。他吸取了西周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重人思想，肯定了人的價值、意志、尊嚴，提出“仁者愛人”，首創了系統的仁的學說，並以仁為核心，創立了儒學。

仁字，在中國古代出現很晚，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與金文中，至今尚未發現有仁字。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會議》，而且僅有一處，是“予仁若考、

《詩經》中，仁字也只有兩見，均出現在《詩經》的《風》。即《詩·鄭風·叔於田》：“洵美且仁”，又《詩·齊風·聲令》：“其人美且仁”。《風》是採取民間，非史官之作，可見仁在西周已出現於民間。仁字在春秋時期，已大量出現，僅《國語》有二十四處，基本意義都是愛人；《左傳》有三十三見，除愛人意義外，還把一些德目也算作仁。中國古代仁的概念，始見於西周之初，至春秋時期，仁的內涵已比較豐富，界說也較明確，多屬個人修養，已成為一個道德範疇。孔子的仁，繼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加以充實和提高，並賦予仁以新的內涵，創新了仁的學說。

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哲學的最高範疇，在《論語》中，有 109 見之多。孔子的仁，內涵很廣，而其核心是“愛人知人”、“泛愛眾”。《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即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是愛人知人。也就是“仁者，人也。”（《中庸》）《論語·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孔子說“泛愛眾”，並非愛所有的人。孔子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對那些道德敗壞，恬惡不俊的惡人，是排除在愛之外的。愛與不愛，愛與惡，其標準就在於是否合乎仁。孔子說：“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論語·里仁》）憎惡人，愛好人，孔子的“愛”、“泛愛眾”，善惡是非分明。孔子還把“利國益民”作為衡量仁人的標準。“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孔子十分強調民的受益，將民受益作為衡量仁人的標準，這是賦予仁以新的內涵，對仁的學說，是個創新。孔子三歲喪父，幼少年時生活貧苦，曾從事過各種勞動，青年時，任“委吏”和“乘田”，是下層小吏，與下層民眾接觸較多，對他們的疾苦較了解，這段經歷，對他往後同情民眾的思想，深有影響。

孔子仁的基本準則，是“立人”、“達人”。《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顏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這兩條基本準則，孔子是側重於前者的。人類社會由人組成，人際關係，基本上是人我關係，即他人與我、群體與個體、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如何處理人際關係，是維護社會安定的關鍵所在。孔子以仁為基礎，為解決人際關係而提出的基本準則，是重群體，將個人置於群體之中。他倡導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主張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在漫長的歷史中，培養出中華民族以國家、民族、社會利益至上的奉公精神。當國家、民族、社會面臨災難時，勇於“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犧牲小我，以保全大我。這種凜然正氣，正是中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成為中華民族歷劫不衰，不斷生存、延續、繁榮的精神支柱。人人敬仰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等等，都是這種凜然正氣薰陶出來的。

孔子重視人的道德，但不認為道德是生而固有的，個人的道德，全憑人在後天受教育和自我努力修養。人的道德修養，要到達仁的境界，孔子認為通過“克己復禮”的途徑，而且還要“力行”。《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力行近乎仁。”（《中庸》）“克己復禮”，就是克制私欲，用自己的言行來

實踐周禮：“力行”，就是努力踐行，努力修養。

孔子重仁，又尊禮。什麼是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左傳》昭公五年）孔子所尊的禮，是周禮，即西周極盛時，由周公旦制定的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典章制度，亦即西周時期的上層建築。孔子對周禮多有讚譽之詞，對諸侯、大夫僭越周禮的行為深惡痛絕，甚至主張復興周禮於東方。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仁先，禮後。仁是禮的內容本質，禮是仁的表現形式。《論語·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述而》：“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在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中，仁貫串於政治、社會、經濟、倫理、道德、文化、教育各個領域，成為孔子哲學的最高範疇。“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這裡所說的“一”，就是仁。因此，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就其核心而言，可概括為仁禮之學。仁學是孔子學說的靈魂和精髓，也就是核心。

孔子“仁學”理論體系龐大，內容非常豐富。諸如：仁的含義，除了愛人是其核心外，還有哪些含意；愛人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特點；對仁的實質，即內涵，從多方面、多層次的具體內容進行剖析；仁學與禮學的關係；仁學與和學的關係；仁學與中庸思想的關係；仁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及思想根源；仁學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如果全面系統介紹，需要很大篇幅，由於不是本文主題，不予論述。對仁學，本文只作簡單介紹。

三 孔子“和論”與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

（一）

在孔子學說中，“和論”與“仁學”密不可分，本屬同一理論體系，但和與仁卻是兩個不同概念。孔子“和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和為貴”，這裡的和，是孔子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仁與禮的高度統一。孔子“和論”的另一個主要內容：“和而不同”，是中庸的主要特徵之一，中庸則是實現仁與禮高度統一的方法論。和是通過踐履仁與禮來表達的，仁與禮既是致和的途徑，又是致和的準則。有鑒於此，所以在談“和論”之前，上節先簡單介紹了“仁學”。

和，古代本字是蘇，最早是指中國古代的一種笙管樂器。《爾雅·釋樂》：“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蘇是集多支笙管為一體，吹奏協和之音，即和聲。和的含義很多，如和諧，和睦，和平，中和，調和……。

孔子“和論”的主要內容，是“和為貴”、“和而不同”。《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為貴”，這裡的和字，指的是和諧，即人際和諧，天人和諧。“和而不同”，說的是和同之別。

和與同，是兩個彼此相異的概念。和，並非簡單的相加，亦不是硬性的拼湊，更不是強行的吞併，而是和諧相濟，協調平衡，是不同事物或不同因素依一定關係的結合，是差異的統一，差異就是矛盾，所以，和也就是對立面的統一，或稱相反相成。和是宇宙萬物存在的基礎，無論是自然還是人事，都是如此。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比單純的符合規律更高一級的是和諧。和諧是從

本質上見出差異面的一種關係，……各因素之中的這種協調一致就是和諧。和諧一方面見出本質上差異面的整體，另一方面也消除了這些差異面的純然對立；因此它們的互相依存和內在聯系就顯現為它們的統一。”（黑格爾《美學》第一卷）同，是重複，完全等同，是完全等同的事物或完全等同的因素的重合。所以，“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上述和同之別，是我們的提法，與先秦時代和同之別的正確觀點，其精神實質，也相符合。

孔子的“和而不同”，這裡的和，是有條件的，有原則的，講的是和諧，求和棄同，不是苟同，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有原則的和睦相處。而仁與禮正是致和的行動準則。“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裡強調的，正是此意。孔子主張求和棄同，所以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是人際關係中，帶有普通性的實際問題和原則問題，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誰都要遇到的問題。和同之意，表面相近，卻有原則區別。歷史上，也有許多不同解釋和爭論。孔子認為，和是有原則的和睦相處，同是無原則的苟同或同流合污。君子應該堅持有原則的和睦相處，對不同的錯誤意見，要反對無原則的苟同或同流合污。而小人則相反，不講有原則的和睦相處，對不同的錯誤意見，而是無原則的苟同或同流合污。

和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現，孔子從已有的思想資料出發，以仁為基礎，創立了自己和的哲學，亦稱和論，或和學。

史書記載，“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呂氏春秋·國民》）“昔者周，益千八百國。”（《漢書·賈山傳》）周平王東遷後，“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至戰國時期，華夏大地，尚剩七雄，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爭戰，由秦統一了中國。這是中國社會的前進過程，它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發展。不過，中華民族的這種文明發展，是以無休止的征伐和兼併戰爭為表現形式的。為了進行戰爭，權勢者們殘酷壓榨奴隸和平民，戰爭又使大量民眾傷亡，處境非常淒慘。遂使奴隸起義的洪流，“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論語·微子》）面對無休止的爭鬥，面對無義戰的現實，反映人民願望的各派思想家，開始討論“和”與大同。其中，史伯和晏嬰的論述，都很精辟。《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在與鄭桓公論述“周其弊乎？”時指出，周必弊，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他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評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集以成百物。”春秋末晏嬰發展了這一思想。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與齊景公有過一段關於和同之別的著名對話。“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嬰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和是孔子思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但在《論語》中卻很少出現和字。這是因為和字在春秋末，人們不常使用，比較生疏，和作為最高的道德境界，顯得高

深僻遠，實行時會遇到拘泥，因此孔子就少講。當時，仁與禮作為人倫日用範疇，已頻繁使用，人們熟悉，淺顯易懂，人人能知能行，所以，孔子就用仁與禮來表達，作為最高道德境界的和，仁字在春秋時期已大量出現，僅《左傳》有三十三處，《國語》有二十四見，《論語》中，仁字有一百零九處，禮字有七十五見。仁講的是待人之道，禮講的是為人之道，仁與禮結合講的是治人之道，這三者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和，只有通過踐履仁與禮才能達到，仁與禮是致和的行動準則。

孔子“和論”的理論基礎是中庸。中庸概念在《論語》中僅一處。《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但實際上，孔子在自己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中，始終貫徹了中庸思想。孔子的孫兒子思作《中庸》，發揮先祖遺訓，引用孔子有關中庸的言論多處。關於中庸的含義，朱熹說：“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章句集註》）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是反對過頭和不及，他贊同晏嬰“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的思想，提出“過猶不及”（《論語·先進》），主張“先執其中”（《論語·堯曰》）《中庸》講“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抓住了孔子中庸思想的實質。中庸思想是孔子的方法論。孔子認為，“過猶不及”都不好，唯有無過無不及的中正是好的。孔子反對“過猶不及”，主張“先執其中”，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有原則的，這個原則就是必須遵守禮。因為有了禮這個標準，纔能明確什麼是“過猶不及”，什麼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正。它不同於折中主義。折中主義是在原則對立的觀點之間，採取無原則的遷就，既承認這個，又承認那個，沒有是非標準。

“過猶不及”，是相對於一定標準來說的，它們是在相反方向上脫離標準的對立傾向，構成名副其實的兩端。按照中庸思想，只有把握兩端，纔能更好地堅持中，並且運用中。中是過與不及的聯結點和分界點。中即有過的因素，又有不及的因素，因此，它既不是過，也不是不及，而是它們的否定。“過猶不及”的思想，或者無過無不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質與量的辨證關係，亦即度量觀念。這就是說，一定的質是與一定的量聯繫在一起的，量的過與不及，都會改變事物的質。為了保證事物具有一定的質，必須既反對過，又反對不及。

中庸思想的另一主要特徵，是提倡“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講“君子和而不流”，是抓住了孔子中庸思想的又一主要特徵。如果說過頭和不及，是踐行中庸思想時，必須反對的兩種傾向...在國際，需要世界和平；在國內，需要社會穩定。因此，孔子的“和論”，很有現實意義。孔子的“和論”與中庸思想，乃是穩定社會的哲學。

孔子生於春秋末期，距今已兩千五百多年，在這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科學技術成就更是可喜可賀。今日科學昌明，一日千里，發展迅速。人類已經廣泛採用電腦、網際網絡；已經能複製動物，雖然各國都在禁止複製人，但從技術上說，將來也是可以做到的，當然，我們應該反對複製人；人類早已登上月球，現在旅行者太空探測儀器又登上了火星，正在把火星上的資料送回地球，在無限的太空中，小小的地球只是

一個小小村莊。像“嫦娥奔月”等神話故事，古人還信以為真，現在都不攻自破了。現代人類社會，由於科技進步，交通和通訊發達，距離大大“縮短”了，相互交往頻繁，互相交流，互相促進，文明已不再孤立，人類聯成了整體，人際關係特別是國際關係，其複雜程度，遠遠超過了春秋末期。一切隨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時代不同，地區不一樣，環境變了，人們的道德觀念、思想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也會隨著改變。如禮學所蘊含的各種制度和行為規範，則因時因地因勢而異，歷代都有所損益。不過，正確的思想是真理，真理的光輝是不會消失的。孔子“和論”的主要思想，即“和為貴”、“和而不同”，在今天仍然是正確的，對人類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明，仍然具有巨大現實意義，但是不能生搬硬套，要把孔子“和論”的主要思想和現代人類社會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賦予適合於現代人類社會需要的新內容，靈活運用，有所創新，只有這樣，纔會生動活潑，富有強大的生命力。如果把孔子的具體論述當作框框，將現代人類社會豐富而複雜的關係，硬往裡面塞，往裡面填，這等於削足適履，塞也塞不進，填也填不完，限制了自己思想的發揮。例如，宗教和諧問題，東西文化交流問題，等等，在春秋末期，均未出現，我們不能要求孔子都有具體論述。但是，我們運用孔子“和論”的主要思想作指導原則，結合現代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照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古為今用。今為主，古為輔；今為體，古為用，這是我們學習與研究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目的和原則。

(二)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二十一世紀就要來臨，在這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人們自然會不由自主地回顧過去，面對現實，瞻望未來。現在，又是千年交接時期，第三個千年開始前夕，進行總結與展望，更富有意義。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本世紀科學技術一日千里，進步迅速，大大提高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使世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提升到空前高度。本世紀是科學技術長足進步的世紀，也是衝突、對抗的世紀。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對抗，在國際關係方面，集中表現在兩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嚴重破壞和阻礙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四年零三個月，戰火燃及歐、亞、非三洲，參戰國家達三十三個，被迫捲入戰爭旋渦的人口達十五億以上，死亡和傷殘各二千萬人。參戰國的直接軍費開支和戰爭造成的財產損失共達三千四百億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歷時六年，戰火席捲歐、亞、非三洲二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地區，先後捲入戰爭的國家和地區達六十一個；被迫捲入的人口達二十億以上，佔當時世界人口的80%，被動員加入武裝部隊的人數達一億一千多萬，死亡五千五百萬，傷殘無數；參戰國直接用於戰爭的費用和遭戰爭破壞的財富，共達四萬億美元。

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主要受害者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廣大的城鄉變成一片焦土。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在十四年的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直接經濟損失達一千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五千億美元；中國軍民死於日軍槍口和屠刀下的共達三千五百萬，傷殘者無法統計，數以萬計的婦女慘遭獸性蹂躪；慘絕

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則是日本帝國主義草菅人命的一個典型。根據1946年遠東國際法庭的不完全統計，在為時六週的大屠殺中，中國軍民被集體槍殺、燒死和活埋的達十九萬人，被零星屠殺者達十五萬人，共計三十四萬人。最近，美國石勇撰寫的《南京大屠殺》一書，首次向世人確定了遇難者下限是：不包括被零星殺害和被奸污後殺害的人數，先是被日軍集體槍殺、燒死和活埋的中國人就至少多達三十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人！

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獸行，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同仇敵愾！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在蠢蠢欲動，中國人民，遭受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其他亞洲國家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必須牢牢記住過去的慘痛教訓，時刻提高警惕，絕不能讓歷史重演！

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人類文明遭受了兩次極大的浩劫！如果再發生新的世界大戰，人類文明將受到推毀性的破壞。核武器的發明和制造，是人類的極大錯誤。目前，世界許多大國擁有大量核武器，對人類造成毀滅性的核威脅。人們產生核恐懼，甚至核恐怖，在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壓力。核武器的制造和保存，需要耗費巨額財富。核泄漏污染又嚴重威脅著人們安全，例如，蘇聯曾經就發生過核泄漏污染事故，很多人身受其害，一旦爆發大國之間的核戰爭，將使人類陷於毀滅性災難，這是人類的悲劇。當務之急，就是在國際上形成一種強大輿論，督促核大國實行核裁軍，通過談判達成全面禁止試驗和徹底消毀核武器條約，並使其付諸實現，把核能用於和平工業，造福人類。

二十一世紀，國際形勢如何？這是很難預測的，因為影響未來國際關係的變數太多，我們現在不知道。本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國際關係的巨變，如蘇聯竟會在頃刻間瓦解，華沙公約隨之解體，德國迅速統一，冷戰隨之很快結束，等等，都是事先無人料到的。將來的世界仍舊是變化莫測的，未來可能會有更多不可想像的事情發生，越遠越難預測。二十一世紀，新的世界秩序會怎樣再造，都是屬於猜測範圍內的事情。結果如何，有待下世紀實踐去證實。不過，自從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局勢是比較緩和了，對世界持續和平有利。然而，地區性的衝突和戰爭，還是常有發生的，如以巴衝突、中東戰爭等等。對於二十一世紀，我們只能祈望是個和平與發展的世紀，但這需要靠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去積極爭取。在爭取世界和平，實現國際和諧，孔子“和論”的基本思想，很有現實意義。本著“和為貴”為最高目標，“和而不同”為基本原則，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加強對話，多交流，促進彼此了解；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共同進步，和諧共處。對有爭議的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協商解決，化解衝突，避免戰爭。1954年，中國與有關亞洲國家，在萬隆會議上，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實現國際和諧的好方案。《人類責任環球宣言》第六章也指出：“兩個國家、團體或個人的爭端應在不使用暴力的情況下解決。”（由“國際間行動理事會”發起草擬，並於1997年9月1日向全世界發表。）

（三）

美國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在學術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對世界和平不利。其實，他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不是學術著作，而是國際政治策略性文章。

亨廷頓說：“我個人假設這新衝突的基本源頭不是以意識形態或經濟為主

。支配人類之間的分裂和衝突的源頭是‘文化的’……國際政治主要的衝突將產生於國與國、或集團與集團之間不同文明的衝突。各文明間的衝突將是未來的爭戰路線。（亨廷頓《文明間的衝突？》，1993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期刊。）“文化本身的一些主要特徵和分歧點比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更難改變或妥協。”（同上）亨廷頓在文章中，是把文明和文化混同在一起的，他所說的文明，實際上就是文化。在亨廷頓看來，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顯然是以中國為首的儒家及伊斯蘭文明，就是這兩大文明的聯盟。在他看來，以中國為首的儒家文明，肯定是今後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對手。

亨廷頓說：“西方必須要為本身的利益去促進其內部的合作與團結，尤其是歐洲與北美之間的合作與團結；將東歐與拉丁美洲併入西方社會中，因為這些地區的文化比較接近西方；維持並促進西方與俄羅斯和日本的合作關係；限制儒家及伊斯蘭文明的軍事擴張；適度地穩定西方的軍事力量，使它在東亞以及東南亞保持它的軍事優勢；利用儒家和伊斯蘭各國間的不同點及衝突；支持其它對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表同情的文明集團；加強那些能反映西方利益和價值觀的各類國際機構並促進非西方國家在這些機構中的參與。”（同上）“在這出現中的紀元，文明間的衝突確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亨廷頓《文明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1996年出版。）“在文明間的衝突中，歐洲與美國倘若不結合在一起的話，則只好個別地被吊死。”（同上）顯然，亨廷頓是在為美國對外政策出謀獻策，提供理論依據。亨廷頓，不僅是哈佛大學的資深教授，也是約翰·俄琳策略研究所的所長，哈佛科學院國際與區域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擔任過卡特政權時代國家安全委員會屬下安全計劃的主任，《外交政策》雜誌的發起人及編輯成員，美國政治學協會會長。上述背景及職位，與亨廷頓的觀點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亨廷頓親自參與過美國外交決策工作，是個有影響的人物。如果美國現實外交政策，真的按照亨廷頓提供的上述方案去做，勢必加劇國際緊張局勢，特別是會使中美關係惡化，從而對世界和平不利。正因為如此，亨廷頓的文章面世之後，很快就在學術界、國際輿論界甚至通俗的傳媒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這在東亞及一些伊斯蘭地區尤其明顯。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一個極其錯誤的理論。從學術觀點看，在國際關係中，引起戰爭的根源，不是文明間的衝突，而是國家之間利益的衝突。國家之間利益衝突，用政治手段無法解決時，遂付諸武力解決——戰爭。縱觀歷史和當今的各種國際衝突，大都發生在同一個文明內，而不是相異的文明之間。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日本侵略中國，德國侵略歐洲，都是如此。其實，亨廷頓本人也清楚這點。他說：“美國與中國的衝突其實也是涉及了權力的基本問題。中國不願意接受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或霸權；美國也不願意接受中國在亞洲的領導或霸權。”（同上）“中國所主導的勢力在亞洲地區的崛起，假使持續下去的話，是向美國的中心利益挑戰的。美國和中國衝突的主因是在平衡將來在東亞的勢力這個問題上的基本差異。”（同上）當今，影響國際局勢不安定的因素，除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因素外，文化也是一個因素。不同文明之間，不同文化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但更重要的是還有互補的一面。二十一世紀是多元文化並存的世紀，只看到矛盾的一面，看不到互補的一面，將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誤導。不同文明之間，不同文化之間，通過對話，交流，

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可以達到化解衝突、和諧共處。東西方文化之間，儒回文化之間，都是可以和諧共處的。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東南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實際上就是東西文化交融的結果。

再從儒家文明來看，儒家“和論”的基本思想，在國際關係上，是反對侵略戰爭，主張國際和諧的。《左傳》指出：“和戎狄，國之福也。”孔子“和論”的基本思想，是“和為貴”，“和而不同”，和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國際關係上，人們都不希望別國侵略自己，自己也不應該去侵略別國。在國際關係中，孔子“和為貴”的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麼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並希得到回報。假如中國人願意的話，他們將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但他們希望的祇是自由而不是支配。……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面貌仍非常平和的。”（羅素《THE ROBLEM OF CHINA》）他又說了“東西方的接觸可能對雙方都是富有成果的。”（同上）

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不是無知，而是有其政治目的。他是位資深學者，又是政治學家，政論家，而且親自參與過美國外交決策工作，對於什麼是戰爭根源，怎麼會不清楚？他在“文明衝突論”中，把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對立起來，危言聳聽，揚言“在文明間的衝突中，歐洲與美國倘若不結合在一起的話，則只好個別地被吊死。”（亨廷頓《文明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1996年出版。）然後，他揮動西方文明大旗，號召所有西方文明國家都站在美國一邊，爭取俄羅斯和日本等，挑撥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和睦相處，分化儒回關係，其政治目的，就是孤立中國，圍堵中國，達到美國“唯一強國，獨霸世界”的意願或美夢。亨廷頓的如意算盤打得很響，能否實現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據帶有權威性的美國蘭德公司預測，到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包括港、台），將達到11萬億到12萬億美元，將佔全球產值的四分之一左右，相當於日本的兩倍。（美國《華爾街日報》，1997年3月20日。）因此，有人認為，“如果不談中國的未來，就不可能談世界的未來。”（沙特阿拉伯《中東報》，1997年3月18日。）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納伊說：“因為圍堵中國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所以美國不會實施這個政策。”（《二十一世紀》，1996年4月號。）“但視中國為敵人是錯誤的。中國現在不是敵人，也沒有理由認為它將來是敵人。中國並不是一個擴張的國家，她目前的主要集中點是發展經濟和改革開放，盡管中國的軍事力量會隨著國力的提高而進一步壯大，但我不認為它會在短時間內成為美國的威脅，如果西方把中國看成敵人，無疑會得到敵人。這是極其危險的邏輯。（同上）

中國的崛起，已是事實。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繼續壯大，也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十二億多，資源豐富，市場龐大。世界上，哪個國家，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誰不想和中國交往？尤其是貿易往來。中國的現代化，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場，使世界市場充滿活力。

中國的現代化，是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的重要因素。亨廷頓想圍堵中國的政策，是很不明智的，這是個極其危險的行動。結局是：圍堵不了中國，斷送世界和平，以失敗而告終。如果美國現實外交政策，按照亨廷頓提供的圍繞中國的方案去做，將會鑄成大錯。

我們祈望二十一世紀，中美人民保持友好關係，兩國政府求同存異，和平共處。這是中美人民之福，世界和平之幸。

(四)

自然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生物生人，蓬蓬勃勃，生機盎然。而現實世界，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特別是到了本世紀，長期忽視和破壞環境。由於人類對自然界進行掠奪性的開發，自然界對人類進行了相應的報復，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大大阻礙著世界文明的持續發展。諸如，大氣變化、臭氧層破壞、酸雨、來自核電站的放射同位素污染、土質下降、動植物物種急劇滅絕、森林遭受破壞，等等，都迫使人們開始檢討我們在地球上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事實正是這樣，1997年最新的調查資料指出，70%的世界海洋漁業資源被過度捕撈；全世界每年向大氣層排放230億噸CO₂，使地球溫度升高；每天估計有70種生物物種絕跡；世界森林就以2%的年速減少。如印尼蘇門塔臘和加里曼丹南部，近幾年年大年大片森林焚燒，濃煙瀰漫到鄰近數個國家，有時空中能見度只有200公尺，飛機班機被迫取消；空氣污染指數有時高達658點危險水平，嚴重危害人們健康，印尼已有二千萬人健康受影響，而印尼有關當局，至今卻尚未採取有效撲滅措施。1994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土質下降也極嚴重，目前，沙漠佔地球陸地面積20%，沙漠化的區域，已達全球陸地面積28%左右，而且還在不斷擴大。由於受到強力的人為衝擊（諸如過度放牧、過度耕作、濫伐樹木、濫開礦藏等等），距離沙漠遙遠的半濕潤甚至濕潤地區，也面臨沙漠化的危險。

在中國，盡管現代化剛剛起步，但環境問題已相當嚴重，1997年的調查資料指出，中國的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不到1%，有些城市有時在衛星和飛機上看不見。舉個例子，1995年中，作者乘車路過福建普江地區，只見天空一片漆黑，疑是烏雲密佈，將有傾盆暴雨，仔細一看，原來是磚窯煙筒林立，噴出濃煙，遮住日光，空氣污染之嚴重，不言而喻。酸雨區的面積超過國土面積的29%，南方有81.8%的城市出現過酸雨；淮河流域的191條支流中，80%的水體呈黑綠色；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量達到每年6.2億噸，累計堆存量達64.6億噸，佔地5.6萬公頃；全國66%的河流和1000多萬公頃土地，受鄉鎮企業污染；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8.2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土地面積的27.3%，且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擴展。涉及全國29個省區共計977個縣、鎮。

從上述資料看，世界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之嚴重程度，可見一斑。因此，重視環保，實現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正確解決這個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人類責任環球宣言》第七章指示：“動物和自然環境也需要保護。爲了目前活著的人以及下一代，人類有責任保護空氣、水源和土壤。

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是立足於人類是自然的主人，人類要征服自然

觀念上。在西方，從近代開始，這種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思想，就佔了統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和約翰·洛克（1632—1700）。現在需要糾正這種片面的觀念，若一味強調對自然界的征服和統治，繼續對自然界進行掠奪性開發，就會導致嚴重破壞自然界的實踐錯誤，從而將繼續遭受自然界的相應報復。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既要改造自然，又要順應自然，以調整自然使之符合人類需要；既不屈從自然，又不破壞自然，以人類與自然協調為理想，這樣，必須借鑒儒學“天人合一”思想，作為實現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的文化驅動力。

西方的生態學和環境理論，有其嚴密的實驗科學論證，不過，在很大程度上，是近現代對生態危機造成惡果所作的被動反應，是受到自然界相應報復之後，進行反省的結果，不是發自內心熱愛自然界的泛愛情懷，缺乏生態倫理意識。要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問題，首先要從人們的思想感情上根本解決問題，人類必須糾正征服和統治自然的片面觀念，樹立熱愛自然界、保護自然界的生態倫理意識，先在主觀上重視問題，然後才能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實際問題。孔子說的“泛愛眾”，可以擴大為既泛愛人類大眾，又泛愛自然界眾物——萬物。儒家“天人合一”論，雖然具有仁民愛物、泛愛自然界的生態倫理情懷，成為實現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的文化驅動力，主觀上解決了指導思想問題，但要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的具體實際問題，許多問題，還要靠不斷發展科學技術，才解逐漸解決。儒家“和論”的“天人合一”論，需要吸取西方生態學和環境理論的科學內涵，使自己具有現代精神，兩者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爭取在傳統工業文明之後，代之而興的將是生態文明，這裏包括人文生態和自然生態，其特徵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這是更高形態的文明。

天人關係問題，是中國古代哲人關注的熱點，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問題。中國古代哲學，天有“自然之天”和“意志之天”兩種含義。我們所說的“天人合一”，即天人和諧，這裡的天，指的是“自然之天”，是自然界。“天人合一”論，就是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的觀點。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源遠流長，早在西周時代，已見端倪。《周易大傳》明確指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回成萬物而不遺。”孟子說：“苟得其善，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指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先秦肇始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經漢唐，至宋朝達到了高峰，其代表人物是張載。他不僅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天人合一”這個命題，還作了比較系統的闡發。他說：“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正蒙·乾稱》）“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正蒙·誠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語錄》上）由上可知，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就是人類與自然界和諧。在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嚴重的今天，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指引人類避免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因此，我們必須弘揚孔子的“和論”，特別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爭取二十一世紀在實現人類與自然界和諧方面，獲得令人滿

意的成就。

人際和諧，範圍很廣。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可見，人際和諧包括國際和諧、國內和諧，家庭和諧，個體和諧。此外，還有種族和諧，民族和諧，宗教的和諧，多元文化和諧，等等，都是人際和諧。孔子的“和論”，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的現實意義，在人際和諧方面，本文只集中談了國際和諧，由於篇幅關係，其餘未能逐一論述。